

台山革命回忆录

(第七集)



中共台山县委党史研究小组办公室编印

台山革命回忆录

第七集

中共台山县委党史研究小组办公室编印

1984年12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背景和中区特委 领导的情况·····	刘田夫 (2)
一九三八年台山党组织的建立和 活动情况·····	梅重清 (12)
抗日战争时期的相持阶段中 台山县组织的工作概况·····	郑锦波 (21)
抗日战争后期台山地下党活动 的一些情况·····	黄文康 (41)
关于四团和滨海大队的一些情况·····	吴 桐 (52)
抗日战争时期台山党组织机构 的变动情况·····	伍伯坚 (60)
解放战争时期粤中和台山党组织 及武装斗争的一些情况·····	谢永宽 (68)
我对台山党史、军史的一些认识·····	马 平 (81)
谈谈我对台山党史、军史一些 问题的看法·····	李安明 (86)
附录: 中共台山临时县委致省委报告·····	(97)

编者的话

去年九月，我县邀请解放前历届县委领导同志四十多人，举行台山党史、滨海地区武装斗争史座谈会。会上有十位老同志作了发言。这些发言，内容丰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党史、军史资料。会后我们曾将这些发言材料整理打印。让更多的人看到，受到教育，并且进一步征求意见，今特将其汇编成《台山革命回忆录》第七集；除余干民同志的发言因与他在本书第四集登出的回忆录内容基本相同、为避免重复而割爱外，其余九篇发言稿均予收入。老同志各人的经历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之年事已高，时隔久远，他们忆述的史料，包括以前各集收纳的回忆录，疏漏也在所难免；而我们水平有限，在编辑过程中，虽对个别史实作了校正，但也不能说已准确无误了。我们热切地希望知情的老同志给予批评、指正。

关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台山县党组织的建立，是属于重建还是创建的问题，过去一直不敢肯定。在本集的九篇发言稿中，有几篇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列举不少史实，试图论证大革命时期我县就有党的组织。今年二月，我们在省档案馆发现一份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台山临时县委致省委报告》，证明一九二八年以前，台山就已经建立了党的组织；也证明一些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是正确的。为有助于征集我县大革命时期的党史资料，现将这份《报告》附录于后。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背景和中区特委领导的情况

刘田夫

一、对日寇侵略活动动向的一些看法

一九三九年江门、新会沦陷之后，到一九四四年打通粤汉线、进兵广西之前这一段，因为日寇兵力不足，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拖住他们一半兵力，在华南国民党统治区中的人民游击队又拖了他们一部分兵力。特别是四一年冬，日寇侵略东南亚各国和印度洋、太平洋各岛，分散了大部分兵力。所以他们在广东的动向主要是巩固广州及其外围，待机而动，不是企图在广东占领地盘（如果他们要占地盘正合我们的心意），在西北江，只占了马房；在中区这一边占领江门、新会，控制圭峰山。一九四一年，敌人两次侵入三埠、台城，看来也是抓一把就走的战术。不是说日寇不想占领我们的地方，而是他们的困难很大，因为当时敌人的最大目的是打太平洋战争，占领南洋诸岛和香港。他们要保广州，占香港，都是为着太平洋战争。要把整个印度洋、太平洋，西到印度，东到澳大利亚以及美国在太平洋各岛，都吞下去。两次进攻三埠、

台城，究竟是什么企图？可否说是试探性质、骚扰性质，一面为了巩固江会，保住广州；同时为了放手大举进攻南洋作准备。这个态势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大举进攻两广，打通粤汉线才改变了。日寇这种做法，就给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留下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广大地盘，增加了我们的工作压力。

到一九四四年，日寇打通粤汉线，进兵广西，妄图囊括整个华南。为什么敌人要搞这一手？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他们要占领这么大的地方，兵力不够，消化不了，达不到以战争养战争的目的。南进达不到目的，又回过头来，企图占领华南。日本侵略者内部也分两派。一派是主张南下，要打南洋；一派主张首先占领中国，吞下中国大陆。并企图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寇在海南岛花了很大力量，占领和开发的行动都很快。如办铁矿、造机器、筑铁路，这些都讲明日寇在想办法搞资源、搞物资，以战养战。但到一九四四年，日寇要回过头来吞食华南的时候，已是兵力不足，强弩之末了。整个世界大战的形势已经根本改变了，苏联已经开始反攻了。

二、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的分析和我党在国统区工作的转变

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初，日寇对中国主要是采取诱降政策。汪精卫公开投降，成立南京伪政府，组织伪军。日寇还实行全面诱降的政策，诱使蒋介石投降。

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这一方针从来没有

改变过，反而日益变本加厉。一九三九年六、七月，国民党反动派搞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广东最明显的是解散抗先、青抗、妇抗等群众组织。我们要继续坚持，但要改变斗争策略，从一九四〇年上半年起，广东省委不再采取抗战初期的群众性的表面轰轰烈烈的办法。我们的干部主动从抗先等半公开的群众组织撤退。我们一边撤，一边发表声明，斥责顽固派。当时李超同志写了一篇声明，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解散抗先的反动政策。

一九四〇年八月，我来到中区，约九月初到赤坎。当时中区特委领导正在交接期间。我是特委书记，副书记梁嘉，组织部长陈春霖，宣传部长杜俊君，后来是黄泽成；青年部长张靖宇，后来是黄泽成兼。四一年省委派李国霖同志任特委组织部长；陈春霖同志改任高明、新兴中心县委书记。经常工作的，先是我和陈、黄，后是我和李、黄三人。梁嘉同志很快调到南路工作去了。

这时，中区顽固派的情况同西江差不多，也掀起反共高潮。台山、开平等地的抗先组织被解散了，我们的党员干部撤出来了。这是省委的方针，是我们工作的主动的转变，不是被动的、被迫的。因为抗日初期，采取了领导抗日高潮的各种形式。形势变了，工作也得变，否则一方面会暴露了我们的党员，另方面工作深入不下去，所以应该转，当时这样做是正确的，是经过斗争，发表声明，抨击国民党反动政策之后撤退干部，转变工作的。原来党办了一批书店，一批刊物；西江特委在罗定印刊物，也开了书店。我来到中区时，我们在赤坎就开了一家书店，都准备撤退了。国民党反动派要解散我们的群众组织，封闭书店，甚至抓人。我们在罗定

的谭朗昭同志同谭启秀的关系较好，做统战工作，办《三罗日报》，但反动派还是把谭朗昭同志抓了，把印刷厂封了，把工人抓去了。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几次反共高潮不能截然分开，因为他们的行动是一次接一次，变本加厉，越来越紧的。一九三九年他们就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反共、溶共、灭共的政策。一九四〇年冬，国民党要我们取消新四军的番号，要我党部队撤到黄河以北，党中央以朱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电报批驳他们。最后我们提议一部分新四军部队可以撤到江北。表面上这是让步，实际上是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长江以北的根据地。党中央这些做法无论在舆论上、行动上都是很主动的。新四军和东南局领导饶漱石、项英等，对国民党顽固派存有幻想，不坚持独立自主，不听党中央的话，叫他们快去苏北，他们迟迟不行动。后来转移，走那条路都由国民党指定，这是严重右倾，造成新四军领导机关九千多人被国民党军队伏击，损失惨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同志为这事写了四句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军事上重新组成新四军，由陈毅同志任军长，刘少奇同志任政治委员，建立了更强大的江北根据地和更强的军队。这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时的一些情况。

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又搞一次反共高潮，但当时由于我党我军有所准备，部队强大，主动反击，加上国内外和社会舆论的反对，第三次反共高潮没有搞出什么名堂。那时，延安的整风运动搞得很好，大生产运动也搞得好，反共顽固派想整我们整不倒。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广东的主要表现是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粤北事件。这不是偶然发生的，是反共顽固派经过长期准备，收买叛徒，搞突然袭击，破坏从江西到广东以至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机关的阴谋行动。

一九四〇年，我们广东党在南委领导下分成粤北、粤南两个省委。粤北省委，李大林为书记，姚伟华为组织部长，黄康为宣传部长。粤南省委，梁广为书记，王均宇为组织部长，杨康华为宣传部长。此外，还有潮梅特委归南委直接领导，中区特委归粤南省委领导。

三、中区党组织在这段期间的工作和所遇到的困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四邑侨汇中断，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丝出口也中断，加上国民党反动统治腐败不堪，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奸商利用旱灾囤积居奇，垄断市场，高利盘剥，人民生活极为痛苦。逃荒、饿死的人非常多，华侨家属拆屋卖屋，卖儿卖女，最后连自己也出卖改嫁了。台山不少华侨妇女被卖到两阳、肇庆、南路去。台山死的和逃走的达几十万人。我到过顺德的麦村，原来一万多人的村庄，那时只剩下五、六千人。我们当时是地下活动，要实际解决人民疾苦问题，是力不从心的。

中区的党组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当时的省委和以后的粤南省委的领导下采取了什么方针？总的来说，是由抗战初期比较公开的集中的群众性的救亡运动高潮（如抗先、青抗、妇抗等），转到比较分散，比较深入的农村、工厂和学校工作，党的活动，由群众运动掩护下的半公开的活动转

到秘密的活动。抗日救亡工作更加扎实。从整个省委的工作来说，有的地区是开展武装斗争，而中区是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搞地下工作。

（一）党的骨干从抗先、青抗等群众组织机构中主动撤退，书店、刊物能转为灰色的群众性的就转，不能转的就撤退，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二）领导机关由城市转入农村。我来到中区特委的时候，机关设在赤坎。没多久，我就转到鹤山、开平、新会三县交界的大朗乡蟠龙村（即郭佛的家乡）。组织部长陈春霖同志就住在新会县的桥下村，我们相距八华里。我为什么转到那里？因为一方面那里有农村的党支部，郭祥为支部书记。另方面那间小学的容宗英，是新会县委委员，是从“抗大”回来的，他在那里当校长，还有三四个党员在那间学校当教师。而且大朗地处三县交界，离单水口只九华里多，交通方便。陈春霖同志住在新会桥下，离鹤山的址山只有四华里。桥下是我地下党员陈灿的家乡。那里有一间小学，有几个我们的同志，高老余当校长，黄佩玲在那里教书。后来的组织部长李国霖同志住在开平的水井村，也是有党支部掩护的。把机关搬到农村，既掩蔽较深，又便于活动。

（三）我党的工作转到加强支部工作，教育工作，支部的武装工作上来。那时，我们党员组织学习延安整风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这些文件都在《新华日报》上登出来的。同时学习《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当然学习方面也不平衡，有的学得好些，有的差些。

另外是整顿党的组织。特委青年部长张××在两阳工作期间，不好好工作，大吃大饮，官僚主义，造成党内很多

意见。经特委派周天行同志调查和整顿半年，肯定两阳的党组织是好的，干部是好的。主要是张的作风不好，同当地干部关系紧张，因此决定撤销他的两阳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回特委机关工作。张回来后，请假回老家东莞，我们同意他回去，并说明在当地参加东江部队活动也可以。我们把他的党关系转到东江，但他久假不归，又不去找当地部队。特委宣传部长杜××，一九四〇年底或四一年初，请假回家后不归队，到张发奎部队工作去了。因此，特委把他除了名。解放后，杜表现较好，现在重新入党。当然这些人在敌人反共高潮下，思想上有些动摇混乱，应当教育整顿；但当时我们对这些人的处理也有点“左”，及时多想办法对他们教育挽救还是不够的。

（四）组织各种形式的武装队伍，准备武装斗争。一种是在党支部领导下组织保护生产或村庄自卫武装队伍。如鹤山大朗支部看更队，保护生产；台山县浮石、莘村、西村等地的自卫队；各县农村凡有较强党支部的村庄都组织了这类自卫武装组织。这种组织实质是党支部领导的，但形式上是灰色的，群众性的。第二种是用统战形式组织的抗日自卫队，如李重民同志领导的长塘洞抗日自卫队。还有，一九四二年赵彬、梅重清等同志在中山八区吴全部下组织的武装小队。当时李安明同志弄来了枪支，派人担到三埠，赵彬再运到中山八区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既然我们掌握了当地武器，为什么要冒险运到中山八区去呢？这个行动带有盲目性。通过统战关系，掌握武装的例子还有，如赵仕浓、赵其休等的地方武装。

（五）派出党员打进去掌握国民党杂牌部队。

如通过周国仪与挺五周汉铃的关系，派进党员掌握了挺五的一个连。现在看来，一九四四年春将这个连拉出来组织新鹤部队，是不明智的。

这里顺便谈谈李桂籍的问题。土改的时候把她划成反动分子，这确实是一宗冤案。她同赵仕浓结婚是我批准的，如果说有错应当是我们的责任，她是为了工作嘛。结婚后，她为党做了很多工作。解放后她受了很大的冤屈，直到死后至今仍未平反，恢复名誉（现已平反，恢复名誉。——编者）。我很早就想找她在什么地方，是今年陆田同志向我谈了，才知道她的下落。这个事情一定要解决。这家工厂的领导这样搞不对。

以后，我们的武装，陈明江的新鹤部队，是一九四四年春组织的；黄仕聪的高明部队，是一九四四年夏组织的；台山的部队，是从中山八区挺进过来后发展起来的。从一九四四年开始，武装斗争就是主要的工作了。

四、南委、粤北事件发生后，我们的应变工作

根据南方局和省委的指示，我们做了以下工作，保存了党的力量。

- （一）地下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
- （二）加强党员的勤交友、勤职业、勤学习的“三勤”工作；
- （三）已暴露的干部转入到敌后部队工作；
- （四）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内去。这个工作很重要，有

几个问题要说明：

李重民同志曾向组织请示，他有关系和条件打入国民党区分部当书记，可不可以？我同意了。还有主动争取的意思。赵向明同志在新兴一间小学教学，集体参加国民党，并负责学校区分部的职务，当时陈春霖同志负责那边的工作，我是和陈春霖同志商量，同意他参加的。这样便于立足，便于掩护工作，这是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造他的反。还有打入《大同日报》当记者、编辑的等等。余和俊、徒司新积当伪乡长亦是我們同意的。当了乡长，就能掌握情况，了解敌人的动向。周健明同志在兴昌小学参加国民党亦是我批准的。郑重（郑海航）通过一个关系打入挺三工作，是我批准的。上述这些，也只是部分例子。这种措施，有的是南委事件后采取的，有的是在南委事件前，根据中央方针实施的。我还和郑锦波同志商量，把台山中学的何文、许秀琼同志送到中山大学去读书，以便更多接触和联系大学生群众。还有从事其他职业的。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

中区党组织也暂时停止活动，但没有中断上下级的联系。只是不作为党的联系，以便了解情况，促进学习和交友，搞好职业、联系群众的工作。特委同县委，县委同下面的支部仍然是有联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就连对党员也没法考察了，散掉了，就不能保存党的力量了。

通过上述的工作，保存了我们党的力量。在南委事件后，我们中区的党员没有一个叛变的，动摇的只有一个李××。他的动摇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原来很重视他，认为他有能力，叫他去鹤山当县委书记。谁料他却离开党回家了，以后又不同组织联系，但他没有暴露我们党的组织。

我认为，我们当时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主要的缺点是：

（一）我们的领导水平不高。我们几个领导只是分工同下级联系。在当时环境下这个办法基本可以。但不少重大问题商量得很不够，有不少事是我个人决定的。如果说当时中区工作有缺点、错误，应当由我来负责。

（二）当时特委分析形势不够。日寇有什么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活动？意图何在？动向如何？我们分析得不够。在方针上的指导也不够，没有具体措施。各县做了不少工作，有些我们也不了解。对日本鬼子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不充分，因此四一年敌人进攻三埠，我们没能发动群众有组织地打击敌人。奸商囤积居奇，剥削群众，我们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也不够。应当说，如果特委的领导水平高一些，方法好一些，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最后，谈谈对党史编写工作的建议：

（一）事实要反复核对清楚。这件工作，同志们和党史办都要注意做好。比如一位同志什么时候入党，谁介绍，在什么地点，入党后曾担负什么工作职务，都要弄清楚；地下党的活动怎样，重大事件事实要搞清楚，搞准确。

（二）对我们过去的工作评价要实事求是，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

这样，我们才能把党史搞得准确，搞得真实，才能得出经验教训，对后代有帮助和教益。

一九八三年台山县党组织 的建立和活动情况

梅重清

大革命时期台山县党组织的活动情况怎样？很多同志都不了解，同时掌握资料也不多。现在我只对一九三八年台山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情况，作个简略的介绍。

我是一九三八年六月回台山的。当时只有我和朱剑虹同志两个党员。朱剑虹是台山人，在广州市第一中学唸书，有肺病，回来医病。当时台山未有党组织，我们的组织关系属于开平县领导，开平县派李木子来同我接头，把我和朱剑虹编为一个小组。我们在台海路开了个碰头会。李木子同志叫我们尽量想办法发展党；其次是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战救国主张；再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他讲完就走了，以后他去了澳门，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省的负责同志是很知道台山的重要性的。一九三八年五月，我从延安回广东，路经武汉，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广东省委负责人黄文杰同志。他接收我的关系后对我说，广东的余汉谋部队因为是地方部队，反共方面不如中央军那么明显；另外，廖承志同志也在广东活动，广东党是处在半公开

活动状态。台山地处沿海，敌人容易进犯；台山华侨多，跟孙中山革命的华侨很多是台山人。台山这个地方很重要。你是台山人，回去要很好地发展党组织，好好工作。那时，我和朱剑虹都是新党员。朱剑虹有病，只我一个人来负责发展台山党，又搞群众工作，力量太单薄。省委已考虑派人来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恰好这时李嘉人同志已写信约请中共党员邝启常同志来台山协助办训练班。邝启常同志接到约请信就到台山来，他向李嘉人、朱伯濂、梅龙夫、马平和我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赞成邝启常同志来协助，同台山办训练班，搞建党和青年运动。不久，大概是七月份，邝启常、古子坚两同志便来到台山。上级党组织指示他们来台山建立党的支部。邝启常任支部书记，古子坚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

台山党组织的建党工作是从一九八三年七月举办“台山抗战知识研究班”开始。当时，这个班是由支部领导。虽然邝启常、古子坚是由李嘉人同志约请来的，但邝启常、古子坚和我是党支部的负责人，举办“抗战知识研究班”是经过支部研究和讨论的。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台山的情况来说，应该说是由党支部同台山青抗会举办的。不然，单是我们三个人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办一个“研究班”，把党建设起来。如果没有过去的基础，要发展党就没有那么容易。任何事情一定要讲当时的历史情况和群众情况，如果离开历史情况和群众情况，单讲个人怎样怎样做，单讲个人的功劳，这是不对的。

大革命是轰动了全世界的革命，当时革命的策源地是在广东。大革命时期台山的情况，同全国一样，受党领导的大革命影响很大。台山有一条新宁铁路，在“二七”罢工后新

宁铁路的工人成立了铁路工会。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同我们争夺工人，在广东组织一个机器工会，同我们唱对台戏，在新宁铁路他们也成立一个机器工会。新宁铁路的铁路工会设在公益，因为它是新宁铁路的中心点。新宁铁路有六大寇，以陈和为首。铁路工会同机器工会的斗争很激烈，机器工会烧了铁路工会的地方。后来，铁路工会的工人处决了机器工会的无恶不作的“六大寇”。因此，大革命时期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在台山新宁铁路的工人中是有基础的。一九二六年党组织派王强亚同志来台山组织过“印务工会”，还派温梦熊同志回来组织过农会。后来农民讲习所派关仲、施展、陈坤、李冠南四位毕业的学员来四邑。关仲到开平，施展到新会，陈坤在江门，李冠南来台山，在台山组织过农会。回忆这些历史情况，我们便了解到：大革命时期，台山就已有过党的活动，也可能会发展了一些党员。据关山同志后来说，在香港和南洋他曾遇见过一些台山籍的党员。

可以说，我们在一九三八年的建党之前十几年中，党在台山已做了不少思想上的、组织上的和群众运动的工作。

大革命时期，何干之（即谭秀峰）同志在中大预科读书，受过大革命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去日本留学，同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在一起接受马列主义教育。一九三二年他和伯濂同志回到台山，向青年传播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知识，很多青年学生都受到他们的影响。何干之同志在思想上理论上为我们台山的建党做了些准备工作，起过启蒙作用。其次，在抗战前台山有不少青年散出到外省、外国去学习或工作，这些青年有相当一部分受到党的影响或接受马列主义教育，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他们或从日本，或从外省，或从广州回